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七十八期
2013年5月　　頁45~74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臺灣—馬華文學*

詹　閔　旭**

摘　要

談到全球華人的跨國連結時，不少研究聚焦於華人文化回歸與傳承中華文化的使命感。但隨著晚近華人地區在地意識日漸攀升，不同華人地區以反思中華性為共通經驗，勾勒出有別於以往的跨國連結模式，本文稱之為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本文將以在臺馬華作家黃錦樹的小說為個案，藉此開展華語語系跨國連結的相關課題。黃錦樹的馬華創作大多在臺灣出版，與臺灣 1980 年代以後的在地化思潮有所對話，他的跨國文學創作生產，讓馬來西亞與臺灣產生可供互動、參照、連結的基礎。此外，本文也企圖檢視以文化異質性為內涵的華語語系研究，背後可能隱藏什麼樣的挑戰。

關鍵詞：華語語系文學　在臺馬華文學　黃錦樹　情感　恥辱

101.06.25 收稿，101.11.15 通過刊登。

*　我要誠摯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讓論文得以更加完善。本文曾另以〈華語語系恥辱的跨國連結：臺灣—馬華文學〉為題名，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在 2012 年 6 月 12 日舉辦的「博士論文工作坊」，感謝當天講評人楊小濱教授，與在場李歐梵教授、彭小妍教授的提問。我同時也要感謝王右君教授、邱貴芬教授，在這篇論文寫作過程的批評指點。

**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談到全球華人的文化連結時，不少研究聚焦於文化回歸與傳承中華文化的面向，中華文化肩負起統攝全球華人共同情感結構的重責大任。然而，隨著華人地區在地意識攀升，晚近日漸興起一股抵抗、反思、或重估華人認同的新趨勢。據此，史書美提出「華語語系」（Sinophone）一詞，試圖描述晚近中國人與華人二分的文化現象。她認為華語語系——包含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等中國以外的華人地區——是一個相對於中國的概念，主張中國人一旦從中國移居到不同的華人地區，中華文化與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必然會日趨異質化、在地化，發展出獨特的在地文化實踐與生活經驗。[1]儘管華語語系地區仍然使用華語，但他們的語言已染上在地風貌，於是乎史書美借用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達里（Felix Guattari）的「弱勢文學」（minor literature）[2]說法，強調「華語語系發聲」（Sinophone articulation）雖然使用的是主流語言，但其實是主流語言的弱勢用法，既獨特又富含政治性格。[3]

然而，華人日趨在地化的現象若以中華文化vs.在地文化的二元對立模式加以理解，可能有所不足。從跨國角度來看，不同華語語系地區的橫向連結，分享他們處理各自中華文化遺緒的行動策略，值得進一步推敲。華語語系地區並非各自在各自的中國情結與在地化難題上單打獨鬥，事實上，華語語系地區的人民由於使用共通的主流語言（華語），華語語系地區因此建立了互動網絡，讓他們產生連結、交流、對話、切磋的可能性。陳光興主張打造「華人批判連帶」，他認為華人文化跨國流動既然是客觀存在事實，那麼華人圈就應該「透過看到不同華人社會存在的歷史經驗，相互對照...轉化我們既有的思考方式，

1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30. 她另外也將中國境內的弱勢族裔歸為華語語系一環，只不過，需要放到另外一個脈絡來談。

2 根據德勒茲和瓜達里原意，「minor literature」並非專指一國之內的少數／弱勢族群書寫，而是用來闡述主流語言的少數化用法，亦即是讓主流語言的句型語感趨於陌生，鬆動了原有的使用習慣。為避免「minor literature」原意遭誤會，目前在臺灣如張錦忠、李育霖等學者多半採用「少數文學」或「小文學」的譯法。史書美曾將「minor transnationalism」翻譯成「弱勢跨國主義」，後文將提及，因此為顧及前後文一致，故此處採用「弱勢文學」的譯法。

3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p. 31.

彼此可以成為批判性的資源」。[4]

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與中華民族主義主導的跨國連結大不相同：中華民族主義主導的跨國華人連結強調共同的族裔、血緣、語言或認同，以同質性為基礎，念茲在茲於文化回歸與傳承中華文化；華語語系主導的跨國連結則側重在異質性的連結，著重在華人與中華文化遷移到新的地區，歷經在地化、混雜、變異以後衍生的新風貌。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一方面帶來有別於大中華意識主導的華人跨國連結模式，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以異質性為基礎的華語語系版圖，如何形構出複雜而深具挑戰性的對話網絡。華語語系一詞隱含的批判潛力令人眼睛一亮，現有論述多從單一華語語系地區的文化生產切入，[5]尚未觸及華語語系不同地區的連結，顯示此議題仍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

臺灣文學與馬華文學之間長久而深厚的互動關係，提供一個檢視華語語系跨國連結的顯著案例。戰後臺灣文學與馬華文學兩個文學場域的關係極為密切，兩地文學場域的連結有文化與政治面向上的因緣。從文化發展面向上來說，兩地的文學生產主要出自中國閩粵地區移民後裔之手，同屬華語語系文化圈，兩地文學史發展進程（古典文學、白話文論爭、現代派美學、在地化主張等等）頗為相似。[6]從政治上來說，在馬來西亞政府對華文教育多所打壓以及戰後臺灣國民黨政府僑務政策鼓勵下，不少馬來西亞華人轉赴臺灣留學，[7]促成馬華作家踏入臺灣文學場域。種種歷史因緣際會讓臺灣與馬華的文學生產浮現一條流通交會的渠道。從1960年代以來，王潤華、李永平、溫瑞安、商晚筠、張貴興、黃錦樹、鍾怡雯等馬華作家在臺灣文壇大放異彩，這一批「臺灣製造」的馬華寫作群，被稱之為在臺馬華文學作家，他們深受臺灣文學薰陶的文學教養，被陳大為稱之為馬華文學場域備受矚目的三大板塊之一，他們的馬來西亞特色同

4 陳光興編，《批判連帶——2005 亞洲華人文化論壇》（臺北：唐山出版社，2005），頁 v-vi。

5 華語語系的相關論述可參考以下二書所收錄的論文：Jing Tsu & David Der-wei Wang, eds.,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Boston: Brill, 2010); Shu-mei Shih, Chien-hsin Tsai, & Brian Bernards, ed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6 黃錦樹，〈無國籍華文文學：在臺馬華文學的史前史，或臺灣文學史上的非臺灣文學：一個文學史的比較綱領〉，收錄於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臺灣文學史》（臺北：麥田出版，2007），頁 131-153。

7 這背後涉及臺灣國民黨政權在冷戰期間的位置，極為複雜，可進一步參考范雅梅《論 1949 年以後國民黨政權的僑務政策：從流亡政權、在地知識與國際脈絡談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2005），頁 29-43。

時也是臺灣文學史家寫史時不可忽略的討論對象。[8]

鑑於臺灣與馬華之間長久的跨國連結基礎，本文將以在臺馬華作家黃錦樹的《刻背／Dari Pulau Ke Pulau由島至島》[9]為個案，深入剖析這本小說如何折射出「以反思中華性」為媒介的當代華語語系跨國連結。黃錦樹出生於馬來西亞南部的柔佛州，1986年留臺唸書，後入籍臺灣。他的小說回應大馬華人在馬來西亞艱困的政治與社會處境，刻劃馬華獨特的在地課題，尤其是2001年出版的《刻背》細膩地處理「跨（國）文化流動下華裔族群的邊緣「他性」、離散經驗、認同焦慮與歷史文化等議題」，[10]此書可視為黃錦樹馬華論述的文學具體成果。然而，黃錦樹的馬華相關創作大多在臺灣出版，與臺灣1980年代以後的在地化思潮有所互動、對話，因此他的跨國文學生產闢拓一個觀察華語語系跨國連結的角度，值得深入分析。這篇文章嘗試以在臺馬華作家的跨國文學生產為切入點，藉此回應華語語系跨國連結的相關課題，這些課題包括：華語語系內部如何對話？如何形成彼此參照？更為重要的是，當我們落實看似基進的華語語系連結時，又將潛藏什麼樣的挑戰？

二、臺灣與馬華的跨國連結

在深入探討黃錦樹的馬華文學創作與臺灣文學的互動以前，需先稍微回顧一下，黃錦樹抵臺留學時，臺灣與馬華社群各自的關懷，以及他們如何產生連結。討論當代馬華文學，難以迴避華人在馬來西亞的處境。馬來西亞獨立建國以後，馬來人掌握政治優勢，尤其是1969年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以及1971年新經濟政策，更確定馬來人主政的政治結構，壟斷政經資源。馬來西亞華人的反彈聲浪在馬哈迪出任首相的1980年代以降，達至高峰，1983年由大馬眾多華團草擬的國家文化備忘錄，正好反映出大馬華人急切發聲的渴望。而在同一年的臺灣，馬來西亞留臺生同樣燃燒著強烈的政治參與使命感。《大馬青年》、《大馬新聞雜誌》、「大馬青年社」等相繼在1983年成立，尤其是1983年11月由張

8 陳大為，〈鼎立的態勢：當代馬華文學的三大板塊〉，《風格的煉成：亞洲華文文學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9），頁 113-126；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9 黃錦樹，《刻背／Dari Pulau Ke Pulau 由島至島》（臺北：麥田出版，2001）。以下簡稱「刻背」。本論文所引用的字句，皆出於此版本，以下不另註明出處。

10 劉建基，〈從全球倫理論異域文化的邊緣議題：以黃錦樹《由島至島——刻背》為例〉，《中外文學》35 卷 4 期（2006 年 9 月），頁 41。

永慶與羅正文創辦的《大馬新聞雜誌》更是一份以政治評論為主的刊物，批判性反省馬來西亞的政治結構。仔細檢視「大馬旅臺同學會」的發展，正好可以看出大馬留臺生心態的演變。大馬旅臺同學會在1970年代原本是一個提供馬來西亞留臺生交流的聯誼社團，然而到了1980年代以後，逐漸轉型為學術研究導向，他們在臺大、政大與師大等各分會出版的特刊，討論大馬時事，關心大馬政治演變，懷抱著「言論建國、學術報國」捨我其誰的使命感。[11]

1980年代左右，大馬華人關心大馬公共事務的行動日益頻繁，與此同時，臺灣社會運動亦如火如荼開展。戰後臺灣長期受到戒嚴令管控，然而到了1979年以後，臺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諸如黨外運動、勞工運動、婦女運動、校園民主運動、原住民人權運動及其他各式各樣社會運動，充分體現臺灣民眾主體意識與權利意識的覺醒，挑戰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手段。[12]臺灣解嚴前後的充沛社會運動活力帶給馬華留臺生衝擊甚大。陳慧嬌曾訪談了不同時代赴臺灣留學的馬華學生，其中經歷過解嚴前後的留臺生，均提及臺灣社會運動帶給他們的影響：無論是學運、示威或野火一般燃燒的集會遊行，這一群大馬留臺生見證臺灣社會上各種反對運動的蓬勃發展，大大異於大馬高壓的政治情境，自然帶來不小衝擊，他們也期許能將這股動力帶回馬來西亞。[13]

一直以來，臺灣是馬華文學發展的重要文化資本輸入地，對大馬留臺生而言，臺灣往往代表開放、自由、現代的社會風氣。[14]從黃錦樹的論述，我們同樣可以看見「臺灣」扮演著類似角色：

> 自60年代以來，留臺生作為冷戰（反共）體制的一環，不知不覺參與了戒嚴臺灣的菁英再生產，在臺灣清楚可見的歷史演變裡——**較**大馬快速的現代化步驟和它的負面效應（污染）及反思（環保議題等）、**較**明確的民主化（揭弊、政黨輪替）及科技的普及（電腦、網路的普及率）、**較**高水平的醫療、**較**均等的機會等等，**一方面臺灣向留臺的大學生展示它（在各方面）的「進步」圖像，以與大馬**

11 安煥然，〈內在中國與鄉土情懷的交雜：試論大馬旅臺知識群的鄉土認同意識〉，《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1期（2003年8月），頁266。

12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merging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Rise of a Demanding Civil Society in Taiwa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 (Jul. 1990), p. 165.

13 陳慧嬌，《偶然生為僑生：戰後不同世代華裔馬來西亞人來臺求學的身份認同》（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06）。

14 何啟良，《文化馬華：繼承與批判》（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9），頁20-22。

較有限的「發展」對照；另一方面，臺灣的公共空間及學術資源提供了更多概念工具和思想資源，可以援引反思大馬的種種議題。[15]

從黃錦樹這段話裡，我們一方面看見臺灣和大馬形成參照，臺灣是反思大馬的起點，另一方面也看到臺灣被建構為「進步」，而大馬被建構為「較有限的發展」。[16]從以上的簡單回顧，我們看見當代臺灣與馬華社群具有相似的社會關懷，因此臺灣文學所關懷的議題，諸如主體建構、在地化、反思中華性的種種思考，在黃錦樹馬華文學寫作與馬華論述，均也可窺見類似的討論。接下來，我想進一步梳理臺灣本土論述與臺灣主體性的相關論述，如何和黃錦樹的馬華文學創作與馬華論述相互呼應？兩者呈現什麼樣類似的意識型態？理論基礎？華語語系文學如何生產出有別於傳統大中華民族主義文學生產的認識論？

三、重探華人認同

首先，臺灣與馬華文學生產均具備自我反思、自我認同轉化的特質。如前所述，1980年代的臺灣正值社會運動與反對運動風起雲湧之際，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辯證交詰備受關注。這一波辯證象徵臺灣人民對中華文化與認同不再全然抱持孺慕之情，相反地，在地意識與日遽增。在本土意識推波助瀾下，臺灣主體性、臺灣認同、臺灣意識等議題開始成為臺灣文學的首要關懷。檢視1980年代以降的臺灣文學生產，我們發現在地化、本土化的情感驅動力影響下，不少臺灣文學作品均深刻地反思「我是誰？」，這股重新探索自我華人認同的趨勢特別反映在當代臺灣的鄉土文學、離散文學、歷史小說、家族書寫等文類上，如葉石濤《臺灣男子簡阿滔》、施叔青《行過洛津》、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等作品，均嘗試回應中華（漢）文化認同之於自身究竟意味著什麼？如何擺脫中華（漢）文化的糾纏？[17]

15 黃錦樹，〈旅臺、馬共與盆栽境遇〉，《文化研究》第 7 期（2008 年秋），頁 85-87。引文粗體字為我所強調。

16 然而，大馬留臺生將臺灣經驗帶回馬來西亞的作法，卻也引起反彈，認為這是用外來（臺灣）觀點鑑賞馬華文學，以他人（臺灣）馬首是瞻。可參考以下討論：端木虹，〈經典缺席？〉，收錄於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辣味馬華文學：90 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2002），頁 132；陳大為，〈「馬華文學視角」VS「臺灣口味」〉，收錄於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辣味馬華文學》，頁 185。

17 詹閔旭，〈恥辱與華語語系主體：施叔青《行過洛津》的地方想像與實踐〉，《中外文學》41 卷 2 期（2012 年 6 月），頁 69-71。

無獨有偶，黃錦樹的《刻背》同樣致力於重新檢視大馬華人的華人認同。收錄於《刻背》的第一篇小說〈大河的水聲〉極具代表性，具體而微點出這本小說集的核心關懷。〈大河的水聲〉描述馬華大作家茅芭之死。茅芭是馬華社群舉足輕重的現實主義作家，以大河小說寫作聞名。小說前半段著墨在茅芭死後，當地華社報紙爭相追緬茅芭帶給當地華文文壇的貢獻。小說後半段，轉向追查茅芭生前遺留下來未完成的工作，幾卷錄製了大河流水聲的錄音帶，以及他有意編選的一套馬華小說選集。小說結局，以一座充滿屍體的馬華文學工廠，暗指馬華文壇的封閉與守舊情懷。〈大河的水聲〉以諷刺嘲謔的寓言手法，瞄準馬華文壇的弊病。[18]小說題目別有意涵。〈大河的水聲〉典出1996年9月張永修在《南洋商報》編的方北方特輯，該特輯名稱即是「大河的水聲」。黃錦樹挪用「大河的水聲」之名，繪聲繪影地以茅芭影射馬華大老級作家方北方，直批馬華現實主義帶給馬華文壇的負面影響。

然而，這篇小說除了批判馬華文壇與馬華現實主義以外，〈大河的水聲〉同時也迂迴側寫出馬華社群難以迴避的華人認同課題。[19]小說裡的茅芭不只是作家，更是大馬中華性的縮影。「茅芭」的名字值得玩味，這兩字分別取自於中國知名作家茅盾和巴金，影射馬華與中華性的連結。堅持中華性，至關重要。黃錦樹的馬華文學經典論文〈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提到，馬華是移民社群，當地華人往往會舉辦各種充滿象徵與儀式化的文化表演——諸如文學節、傳火、端午與農曆年等節日活動，鞏固華人移民的身份與文化認同。[20]馬華文學同樣也背負了維繫馬來西亞華人認同的使命。從這個角度，小說裡茅芭盛大的喪禮以及報紙眾人浮誇的反應無疑是一種文化表演。小說裡「馬華公會的黨旗、中華總商會、全面華校教師總會、作家協會、作家服務的小學等諸多民間團體的旗子」（45）一面一面、煞有其事地覆蓋在茅芭棺木上，透過華文作家的盛大的告別式，一方面提醒與會者中華文化與中華性在馬來西亞風雨飄搖、岌岌可危（「華教的堡壘，又倒了一座」（42）），另一方面透

18 在馬華文學隊伍裡，諷刺嘲謔可說是黃錦樹最獨特的寫作腔調，礙於篇幅，無法開展此處的討論。可參考張錦忠，〈謔近於虐《刻背》〉，《聯合報》第 30 版（聯合副刊），2001 年 12 月 10 日；高嘉謙，〈歷史與敘事：論黃錦樹的寓言書寫〉，《中國現代文學》9 期（2006 年 6 月），頁 143-164；高嘉謙，〈骸骨與銘刻：論黃錦樹、郁達夫與流亡詩學〉，《臺大文史哲學報》74 期（2011 年 5 月），頁 103-125。

19 馬華現實主義帶給馬華文壇的負面影響向來是黃錦樹文學與論述的核心關懷。不過，這一篇論文以華語語系地區的認同轉化與跨國連結為主軸，馬華現實主義涉及文學場域與世代，基本上是另一個課題，需另闢論述空間。

20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元尊文化，1998），頁 115。

過這場大型的喪禮，重新鞏固華人認同。〈大河的水聲〉敘述者在小說裡以「劇目」來比擬茅芭之死，呼應馬華的移民歷史處境。

值得注意的是，當代馬華社群對於華人認同的堅持，並非源自於對中國或中華文化無限的依戀，而是與馬來西亞國家民族概念的形成息息相關。[21]《刻背》第二篇小說〈阿拉的旨意〉深入揭開馬華華人認同的複雜面向。〈阿拉的旨意〉描寫敘述者——華人——因意圖發動革命，反對馬來人種族主義，遭馬來人主導的政府以叛國罪名逮捕。他的判刑不是死刑，而是囚禁孤島，以新的（馬來人）身份在新的環境生活，並改信回教，從此不得使用中文，不再說中國話。這篇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的自白書形式展開，叨叨絮絮講述這一場文化換血實驗的來龍去脈以及「我」的內心變化。

「失去自我」是〈阿拉的旨意〉的主要探討課題，然而小說裡的「我」並沒有全然接受文化換血實驗，而是思考是否可能抵抗換血實驗，贖回自我：

> 畏懼死亡。畏懼該以甚麼身份被埋進土裡。最令我感到恐懼的是，為免造成子女一輩子的困擾，我竟考慮以馬來人的身份死去。一旦如此，我就徹徹底底的認輸了。
>
> 而另一個自我頑抗著。
>
> 最近我物色了幾塊石頭，準備銘刻一些痕跡。
>
> 刻漢字太顯眼，一下子就被識破，而惹上大麻煩。
>
> 我想起古漢字都是象形的，然而我並不識篆文，只能憑想像而會意。刻一些圖案或圖象，並不算違約。（103）

在這裡，小說展示了「我」的分裂與拮抗，一個是受到政府認可的「馬來我」，一個是受到政府壓抑、意欲驅除的「華人我」。為了抗拒「馬來我」，敘述者試圖留下痕跡，證明「華人我」的存在。這個痕跡就是書寫的痕跡，書寫成了贖回華人主體性的方法。這篇小說採用自白書的形式呈現，以第一人稱「我」的訴說為故事軸線，堅持以中文字書寫，提醒讀者，書寫、身份認同與主體性的密切關連。大馬華人在馬來西亞以華文寫作，是鞏固民族身份與文化屬性的方式，以此回應大馬的種族政治。換言之，華文書寫讓「華人我」的存在成為可能。這樣的書寫實踐無疑充滿悲劇色彩，是以書寫成為銘刻，成為即使「許多字的形體要嘛記不全（少一筆或多幾筆，或記成別的形體，或者只是個朦朧的印象，或只記得它的聲音……），不管怎樣，非不得已我決不用馬來拼音替代」（85）。

21 陳志明，〈華人與東南亞民族的形成〉，《亞洲文化》9 期（1987 年 4 月），頁 55。

黃錦樹小說裡重新詮釋大馬華人與中華性之間關係，他對於馬華華人認同的詮釋，別具深意。〈大河的水聲〉和〈阿拉的旨意〉位列《刻背》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前者討論馬華文壇／社群的文化表演，後者討論馬來主導的國家霸權所施加的暴力，兩篇小說合而觀之，徹底呈現《刻背》一書的「訴求」。面對國家暴力的擠壓，華人認同反倒日漸鞏固，相應而生的是華人認同日趨表演化、儀式化、族群情感澎湃蕩漾。這兩篇小說探討的議題互為因果，勾勒大馬華人認同的獨特之處。黃錦樹提醒我們，當代馬來西亞華人認同雖隱含中華性，但中華特性不過是馬來特性的鏡像。[22]王賡武也主張，中華民族主義在1950年代以前的幾十年，曾在馬來西亞華人社群佔有一席之地，但是約莫在1950與1960年代以後，馬來西亞華人開始從中華民族主義認同轉向認同新興的馬來西亞國家認同，積極尋找華人在馬來西亞多元族群想像裡頭的位置。[23]換句話說，大馬華人的華人認同、中華性以及與中華文化之間的緊密關係，必須脈絡化檢視，大馬華人認同是馬來西亞獨立以後華人回應馬來國家文化霸權造就出來的結果，並非華人與生俱來的使命感。[24]從某一方面而言，大馬華人具有馬來西亞國家認同的共識，但另一方面又希望能顧及華人的獨特特質與文化認同。換句話說，〈阿拉的旨意〉裡頭「馬來我」與「華人我」之間的辯證，正好折射出馬來西亞國家文化政策與馬華社群之間的張力，如同何啟良所言，這是「民族融合」和「自我定位」兩股力量之間難以化解的矛盾。[25]

從「中華民族主義」到「馬來西亞國家認同架構下的多元種族」，藉由黃錦樹的《刻背》，我們可以看到大馬華人如何經歷自我認同的移轉，衍生出重新定義大馬華人認同的具體實踐。[26]華人與中華文化、中華性、中華認同之間的關係，必須放在馬來西亞獨特的政治語境檢視。事實上，黃錦樹前作《夢與

22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國家）民族主義：論馬華文學的創傷現代性》，《中外文學》34 卷 8 期（2006 年 1 月），頁 187。

23 可參考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 238。但王賡武也主張，就算在中華民族主義認同高漲的 1930 與 1940 年代，也並非所有大馬華人都認同中華民族主義，可參考同一書頁 327 的討論。

24 陳志明，〈華人與東南亞民族的形成〉，頁 55-58；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 53-56。

25 何啟良，《文化馬華：繼承與批判》，頁 29。

26 這裏所謂「馬來西亞國家認同」描述的是《刻背》一書所呈現的大馬華人，並沒有刻意指涉寫作者黃錦樹本人的認同。我在訪談黃錦樹時，曾問及他是否具有馬來西亞國家認同，他的回答頗為平和（相較於李永平的極力否認），「我是還好啦，我認識的馬來西亞人一般而言都有很強的國家認同」。

豬與黎明》、《烏暗瞑》裡收錄的篇章，如〈大卷宗〉、〈魚骸〉等，均觸及大馬華人認同的課題。[27]顯然，華人自中國移居至馬來西亞，經歷好幾世紀與當地種族的接觸和互動，馬華文化與馬華的社會處境已經不能再放到大中華文化傳統的框架來解釋。誠如林建國在他1991年討論馬華文學的重要論述〈為甚麼馬華文學？〉，以「源」與「流」的辯證指出馬華文學和大馬歷史相互纏繞，早已是中國文學詮釋視野無法捕捉的他者，從中國文學分「支」出去自己「流」。[28]馬華與中華文化的關係呼應史書美對華語語系的定義。史書美借用翻譯理論，主張中國與華語語系地區之間的關係並非是正本和複本的關係，而是一種翻譯的實踐。中華文化從中國境內遷移海外的過程，在不同媒介和文化經驗的轉化過程裡，彷彿從某一文化翻譯到另一文化語境，早已產生複雜且因地制宜的變貌。[29]

馬華的翻譯特質在《刻背》暗藏的各種經典指涉，得以窺見。例如唐朝詩人劉禹錫名作「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到了黃錦樹《刻背》的封底，竄改成「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鴉港口**夕陽斜」。「烏鴉港口」取自馬華前輩作家韋暈的〈烏鴉港上黃昏〉，因此，從「烏衣巷口」到「烏鴉港口」的字詞替換，一方面標舉出馬華文學有其自身的歷史參照，不必然放在中國文學脈絡底下，另一方面也指涉韋暈在該小說鋪展的華巫關係，暗示馬華需放回到馬來西亞的種族關係內思考。《刻背》在重讀經典、詞語翻譯的文學實踐裡，隱含重新尋找大馬華人（有別於中國的）獨特歷史位置的企圖，以此定義華人遷居到馬來西亞以後所遭遇的身世。馬華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境外翻譯，已開展出自己生命的難題，兩者不宜混為一談。

此外，《刻背》的小說語言更深刻彰顯從「中文」到「華文」的翻譯歷程。〈老虎屎與萬字票〉這一篇小說以戲謔笑鬧筆法，捕捉馬來西亞鮮活靈動的小人物風情，小說用詞遣詞間參雜大量方言雜語，尤其是特色所在：

關於老雞母這個據說年輕時頗有豔名的寡婦中了兩千元萬字票這條

27 然而，與前兩本作品相比，《刻背》的獨特處在於它不只捕捉了大馬華人的認同變遷，更著力於馬華認同及在地議題的跨國接受，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應。《刻背》收錄在王德威為麥田出版社規劃的「當代小說家」系列，黃錦樹在規劃《刻背》的寫作計畫時，便深有自覺地想要回應馬華文學在華文文學版圖的位置。我將在論文後半段討論這個問題。

28 林建國，〈為什麼馬華文學〉，收錄於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主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II》（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頁 28。

29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p. 5.

> 大代誌，很快就由多嘴的收黑萬字的拉薩傳遍了這個叫做「乾巴」（Kampat）的小鄉鎮。老雞母起先還假裝沒有甚麼事情發生，可是伊心底的興奮不是那薄薄的兩片刀片唇所能閉幕的，伊的鑲金門牙自動的洩底招風——無端端怎麼見人就笑？（167）

前此馬華文學作家——如李永平、張貴興——向來以華麗純正的中文寫作而聞名黃錦樹在這篇小說裡，卻大量參雜閩南語、馬來語等，諸如「大代誌」、「Kampat」、「無端端」等，呈現出馬來西亞式獨到的華文語法，展現張錦忠所謂與中國文學語言決裂的「異言中文」（Chinese of difference），賦予馬華華文書寫有別於以往，也有別於其他地區華文書寫的全新面貌。[30]小說最後也附上五個註釋，解釋「萬字票」、「三星仔」、「古靈仔」等詞語的意思。黃錦樹極少替他的小說附上註釋，這一篇的操作可以凸顯馬華的異質色彩。無論是從語言使用或刻意加上的註釋，〈老虎屎與萬字票〉清楚地展現出馬華書寫的翻譯性格。小說裡的馬來語、閩南語、或馬來西亞獨到的華文句型都是被翻譯的他者，透過翻譯實踐，讓他者侵入中文，進而讓「中文」讀起來不像是「中文」。翻譯實踐具有高度政治使命。黃錦樹認為華文文學裡混雜各種在地語言的書寫模式，可呈現出「破中文」的語言形式，這是一種抵抗、否定、放逐甚至廢棄中華性的文學實踐。[31]黃錦樹的小說在某個程度上，似乎反映出他自己所定義的破中文特質，但黃錦樹的小說又沒有破到走向純正中文的對立面。[32]我認為與其採用二元對立觀點，將黃錦樹的小說放在抵抗、放逐甚至廢棄中華性的隊伍，倒不如說它鬆動了中華性至高無上的地位。華文不再是唯一，而是選項之一。令人眼花撩亂的方言雜語，銘刻出大馬華人與馬來西亞不同文化長久以來跨文化接觸的歷程。

---

30 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臺北：麥田出版，2003），頁 216。

31 黃錦樹，〈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畫？〉，《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臺北：麥田出版，2003），頁 30-33。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黃錦樹在該文以中文現代主義為討論對象，並沒有使用華語語系一詞，但是黃的論述其實已經為日後華語語系文學論述奠定基礎，史書美討論華語語系文學一詞的首篇論述“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便特別徵引黃錦樹的華文文學語言觀。

32 將李永平視為純正中文代表，而把黃錦樹分派在破中文，如此區分方式不夠精準。這一點需感謝審查人的特別提醒。我訪談黃錦樹時，他也提及自己無法走向破中文一路，因為技術面就是首要難題，黃錦樹說：「如果在語言上你要做這道工程的話，寫作的速度會全部放慢下來。就變成一個句子、一個句子，半個句子、半個句子在那邊打磨」。

四、恥辱作為華語語系的連結基點

以大馬的種族關係重新詮釋馬華認同是黃錦樹小說特色所在，一方面凸顯華人認同的在地化傾向，另一方面也挑戰了以往大中華民族主義的詮釋框架（文化回歸、花果飄零等）。黃錦樹小說的關懷呼應臺灣文學的本土轉向。我想回到〈老虎屎與萬字票〉這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說，因為它不只翻譯了馬來西亞語境，臺灣也是這篇小說的翻譯對象。這一篇小說在「小說故事」與「註釋」中間，標出一行字，頗令人玩味：「將訪花蓮，謹以此文向已故的王禎和先生致敬」。這段話透露出臺灣文學與黃錦樹之間的連結。黃錦樹從小在馬來西亞即閱讀臺港文學，1986年留臺以後，更汲汲營營吸取臺灣文學養分，他的作品深受臺灣文學影響。[33]〈老虎屎與萬字票〉的這一段話一方面是向王禎和致敬，另一方面也不妨將其視為小說形式設計一部份，指出黃錦樹的混語書寫與臺灣文學之間的幽微互動。使用方言打亂白話中文既有的書寫語言，是臺灣文學場域挑戰、顛覆、鬆動傳統中華文化認同的常用形式。自1960、1970年代以降的現代派小說裡，便可發現小說家將臺灣在地方言、母語融入作品的語言實驗手法。到了1980年代，伴隨臺灣意識日興，這種現代派語言實踐性質濃厚的創作手法意外奠定了鄉土小說利用混雜語挑戰純正中文權威，打造臺灣在地生活鮮活的策略，王禎和、黃春明、宋澤萊皆是顯著案例。[34]放在這個脈絡來談，〈老虎屎與萬字票〉這篇以混雜中文顛覆純正中文的語言實踐，顯然呼應臺灣文學本土轉向的指涉。

從黃錦樹這篇仿效臺灣鄉土派文學語言形式的小說，我們可能必須要思考，黃錦樹小說建構的馬華論述如何和臺灣本土論述的核心關懷交會。我認為兩地之間折射出一種「以反思中華性」為驅動力的跨國連結模式，展現臺灣與馬華之間新的連結模式。臺灣與馬華之間在1950年至1970年代的文化連結，屬於文化回歸模式，屆時臺灣處於冷戰流亡政權情境，馬來西亞來臺華人往往被

33 由於臺灣與馬來西亞華人的關係緊密，黃錦樹在高中時期便已在馬來西亞華校圖書館閱讀臺灣相關的文學與文化論述。我訪問黃錦樹時，他提到：「我們在馬來西亞的時候看到很多臺灣出版品。那些留臺的會把臺灣的書帶回去，不管什麼鄉土文學、黨外雜誌、李敖、殷海光之類的。什麼書籍都有了，不只有五四。我們高中那時候就慢慢知道臺灣發生的事情，以前不知道，但是在高中就慢慢知道了。夏志清的文論、陳若曦他們的東西，我在圖書館都有讀到。」另可參考陳大為的回憶。陳大為，〈大馬旅臺文學一九九〇〉，《臺灣文學館通訊》33 期（2011 年 12 月），頁 42。

34 邱貴芬，〈翻譯驅動力下的臺灣文學生產〉，收錄於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張誦聖、劉亮雅合著，《臺灣小說史論》（臺北：麥田出版，2007），頁 254-259。

視為海外愛國華僑回歸，有助於鞏固中華民族主義在臺灣的正當性。[35]時移事往，這樣的論述取徑卻不適用於理解1980年代以後馬華作家的跨國移動。1980年代以後的馬華留臺生雖同樣循著臺灣華僑獎勵政策赴臺，但為數不少學生已懷抱馬來西亞國家認同，反映新世代大馬鄉土認同日益高漲，積極參與馬來西亞政治事務的特色。[36]1980年代以後來臺的馬華作家不再將神州大陸視為原鄉，反而將視線投回馬來西亞紛亂的政局與現實社會，批判性檢視華人認同與文化。黃錦樹接受駱以軍訪談時，清楚標明《刻背》關注大馬現實的姿態：

> 相對於李永平的《吉陵春秋》作為中國性——現代主義的經典之作，幾近完美的現代主義型式設計、「純正中文」的語言操作，「純手工打造」的文學史界，婆羅洲故鄉被文字的原鄉所覆蓋，對古典白話中文的迷戀——其關鍵詞為完美、純粹。我的《刻背》同樣作為一本書，同樣作為中文現代主義未了的方案的一種實踐，關鍵詞卻是殘破、雜糅。向大馬的當下現實敞開，或者說，活生生的殘酷現實讓它注定的不完美。譬如那黑色之頁、亂碼之章、烏鴉與父輩政治犯的剪報（「文獻寫實主義」的操作），都指向現實的集體哀傷，沉默的抗議。[37]

從這段話可以發現，黃錦樹的文學創作「向大馬的當下現實敞開」，早已遠離前行輩與文化中國靠攏的路。

因此，臺灣與馬華之所以產生連結，除了奠基於可相互溝通的共通語（華語）以外，更重要的是兩地的情感結構十分近似，兩地都面臨從「中華文化認同」轉向「華語語系認同」的考驗，必須處理在地化過程所引發的種種課題。恥辱在華語語系跨國連結的過程裡，扮演舉足輕重的情感連結點。現當代中文研究對恥辱論述並不陌生。目前在中文與臺灣文學學界談到恥辱時，時常聚焦在「西方凝視」與「中國恥辱」，強調恥辱情感在中華文化邁向現代化的過程裡，佔據舉足輕重的位置。[38]恥辱，在此不單只是個人的私密情感，更足以投

35 范雅梅，《論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權的僑務政策》，頁47-54；張錦忠，〈文化回歸、離散臺灣與跨國旅行性：「在臺馬華文學」的案例〉，收錄於李有成、張錦忠主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臺北：允晨文化，2010）頁539-542。

36 安煥然，〈內在中國與鄉土情懷的交雜〉，頁265；張錦忠，〈文化回歸、離散臺灣與跨國旅行性〉，頁546。

37 黃錦樹，《土與火》（臺北：麥田出版，2005），頁313-314。

38 張小虹，〈現代性的小腳：文化易界與日常生活踐履〉，收錄於馮品佳編，《通識人文十一講》（臺北：麥田出版，2004），頁207。

射出社會的集體情感狀態。[39]這種力圖引領「中國」擺脫東亞病夫形象，藉此將西方帝國主義視為假想敵的二元思考模式，背後隱含強烈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意識型態。[40]東亞病夫恥辱感受在馬華作家隊伍亦有跡可尋，李永平堪稱典型。李永平代表作《吉陵春秋》（1986）標榜「純化中文」，打造一座前現代仿古小鎮，透露李永平抗拒西化的態度。《海東青》（1991）與《朱鴒漫遊仙境》（1997）以摩登臺北為小說場景，描寫臺灣人崇洋媚外，或者刻畫美國人或日本人調戲臺灣人，讓臺灣人受辱的場景，勾勒傳統中華文化道德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的侵蝕下難以迴避的潰散。李永平這幾本小說所呈現的反西化、反現代、反資本主義論述，正是以東亞病夫恥辱感作為驅動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敘事。恥辱感是凝聚全球華人心向祖國不可忽視的情感節點。

黃錦樹小說同樣呈現強烈的恥辱感受，只不過這種恥辱感受並非源自於上述這種從西方手中拯救中國的情感，小說不再批判西方帝國主義，而是將文化中國、內在中國、中華性視為批判對象。小說裡時常出現的「父親」隱喻，成了阻礙、包袱、歷史幽靈，成了恥辱的根源。我想回到〈大河的水聲〉這篇小說，這篇小說鮮明地反映出一種極欲反省中華性的慾望。〈大河的水聲〉小說後半部講述一個地下密室。我們隨著小說主角視線，打開一個又一個鎖上的密室的門，赫然再次看見茅芭屍體，赤裸裸展示在巨大的玻璃櫥內。不僅如此，馬華文學史上的著名人物（從中國南來文人到馬華華教鬥士）的屍體都展示在這間馬華文學地下密室。這間密室無疑充滿隱喻。小說敘述者這麼形容這間密室：「在門外就可以聞到撲鼻惡臭的房間」（78）。這間密室即是馬華文壇，黃錦樹藉由層層上鎖的密室，暗示馬華文壇侷限在不見天日的密室，宛如戀屍癖般擁戴在地作家。馬華文學乃至於大馬的中華性均籠罩在強大的召魂論述。[41]

39 Emma Hutchison and Roland Bleiker, “Emotional Reconciliation: Reconstituting Identity and Community after Trauma,”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1.3 (Aug. 2008), p.392; Sally R. Munt, *Queer Attachment: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hame* (Hampshire and Burlington: Ashgate, 2007), p.2.

40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頁 19-21。

41 黃錦樹小說裡的召魂論述是他鮮明的寫作特色，多位論者的論述已有觸及，可參見林建國，〈反居所浪遊：讀黃錦樹的《夢與豬與黎明》〉，收錄於黃錦樹著，《刻背》，頁 370；王德威，〈壞孩子黃錦樹：黃錦樹的馬華論述與敘述〉，收錄於黃錦樹著，《刻背》，頁 23。值得注意的是，召魂論述的詮釋效力有多強，或許值得思考。莊華興主張黃錦樹將大馬華人命運扣回離散華人的脈絡下，往往過度強調「離散」與「中華性」的辯證，莊華興認為離散情結只是局部事實，並不能全面回應馬華的政治處境。邱貴芬也認為黃錦樹深受馬華傳統文化薰陶，那麼黃錦樹的文學生產總已無法

〈大河的水聲〉以地下密室比喻大馬華人處境，無獨有偶，收錄在《刻背》裡的許多篇小說的場景也設定在封閉空間，如〈天国的後門〉裡的監獄、或者〈阿拉的旨意〉、〈補遺〉等篇的孤島意象。「封閉」意象流竄在整部《刻背》。小說敘述者對「封閉」的批判，提醒我們黃錦樹引「封閉的馬華」以為恥，封閉感讓大馬華人與中華性緊緊綑綁在一起，中華性是阻礙、包袱、歷史幽靈，讓大馬華人緊抱著空洞的中華符號，彷彿膜拜地下室內散發惡臭的屍身，無有出路。

從李永平小說到黃錦樹的小說，一種典範的轉移隱然浮現：李永平小說站在中華民族主義的立場，批評西方帝國主義；而黃錦樹小說則把批判對象從西方帝國主義轉到大馬中華性。藉由批評典範的轉移，華語語系地區湧現新的情感結構，這個情感結構跳脫了心向中國、血濃於水的中華民族主義範式。黃錦樹小說所呈現的恥辱，並非傳統習以為常的東亞病夫恥辱論述，而是華語語系恥辱，是華語語系地區獨特的情感結構。當代情感研究對於恥辱的討論，有助於釐清這裡所謂的華語語系恥辱。情感研究先驅湯姆金斯（Silvan S. Tomkins）主張恥辱是一種感受到自身不足、缺陷、挫敗的情感狀態，恥辱因此讓我們將注意力從外在移往自我內在，是「自我意識到自我的經驗」（an experience of the self by the self），重新思考「我是誰」，只是這樣的狀態並不愉快，反而充滿自我意識的煎熬，不斷地自我否認，質疑自我既有的內涵。[42]換言之，恥辱是一種促進自我轉化的情感驅動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恥辱呼應晚近華人自我認同的轉化：當不同地區華人紛紛質疑「中國人」空洞的身份與文化認同，轉而培養在地認同之際，這即是走進了「自我意識到自我」的時刻，重新思考自己是誰，不再把「自我的（中華文化）內涵」視為理所當然，也不再以中華文化為唯一主導價值。[43]

恥辱所提供的倫理動能——即是一種不安於己、生生不息、日益求變的基進想像——可以用來解釋黃錦樹小說對於中華性的反思。由上面的討論可知，

避免和他所批判的戀屍情結絞鏈在一塊。可參考莊華興，〈離散華文作家的書寫困境：以黃錦樹為例〉，收錄於陳建忠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11），頁 494；Kuei-fen Chiu, “Empire of the Chinese Sign: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Diasporic Imagination in Transnational Literary P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7.2 (May 2008), pp.606-607.

42 Silvan Tomkins, *Affect, Imagery, Consciousness: The Complete Edition*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359.

43 詹閔旭，〈恥辱與華語語系主體〉，頁 69-70。

黃錦樹大力批判大馬華人民族主義流於僵化、封閉、空洞，而為了打破大馬華人封閉的處境，「流動」成了解套之路，「流動」成了打開視野，走向更廣闊世界的唯一策略。「流動」即是擺脫以華文書寫為尊，將「馬華文學」正名為「馬來西亞華人」，把白話中文文學、古典中文文學、峇峇馬來文學、英文文學、馬來文學等多語書寫都納入馬華文學的範疇，正視馬華的駁雜性。[44]除此之外，「流動」的必要性在《刻背》書名展露無遺。《刻背》在書的設計上相當有意思，這一本書共有兩個書名，[45]「刻背」、「Dari Pulau Ke Pulau由島至島」，分別出現於封面、書背。兩個書名顯然肩負截然不同的意義，如果說「刻背」（如同書裡同名篇章的小說故事所暗示）捕捉了大馬華人受到銘刻、凝視、污名化的恥辱，[46]那麼「由島至島」則彰顯出離開封閉孤島的決心，朝向另一個島嶼邁進。黃錦樹的馬華論述批判封閉的馬華環境，不應繼續抱著宏大但虛妄的華人民族主義不放，誠如他所言，「**環境如此不利，保護主義無濟於事，借用他人的資源及不斷的反思求進方是上策**」。[47]有別於前作《夢與豬與黎明》、《烏暗瞑》以馬來西亞為寫作對象，《刻背》即是小說家走出幽黯封閉膠林的進一步嘗試，這本小說不只以更嫻熟的小說技法刻畫大馬華人的課題，同時也放大格局，以廣闊的視野檢視東南亞華人的處境，諸如〈猴屁股，火，及危險事物〉談新加坡與馬共，〈補遺〉刻畫印尼排華運動，〈未竟之渡〉描寫自臺灣到馬來西亞定居的臺籍日本兵等等。從馬來西亞離開以後，黃錦樹的小說視域大幅開展，目光觸及整個東南亞華人相似的生存處境。

同樣地，華語語系恥辱在臺灣文學與文化場域也扮演不容忽視的要角。1980年代以後，臺灣在地化、本土化與臺灣意識的認知逐漸興起，反思中華文化與中華認同同樣是彼時臺灣文化界核心關懷。值得一提的是，後殖民論述與海洋臺灣想像在此時開始備受關注。1990年代初期，《中外文學》由邱貴芬、廖朝陽、廖咸浩、陳昭瑛等學者所引發的後殖民理論辯論是一場前哨戰，深入觸及臺灣人複雜的身份認同、多元族群想像與文化混雜等議題。這一些論述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進一步深化為海洋臺灣的論述，主張臺灣屬於海洋國家，具有開放、流動、跨界、多元、混雜等特質，藉由海洋臺灣，將臺灣置於中心，歷時性勾勒出臺灣與西班牙、荷蘭、清朝、日本、中華文化、戰後美援等不同文

44 黃錦樹，《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吉隆坡：華社，1996），頁 26。張錦忠，〈中國影響論與馬華文學〉，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編，《馬華文學讀本Ⅱ：赤道回聲》，頁 33。

45 有些學者認為是三個書名，即「刻背」、「Dari Pulau Ke Pulau」和「由島至島」。

46 我在論文後半段會進一步分析〈刻背〉這一篇小說的意涵。

47 黃錦樹，《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頁 7。

化的交流互動。海洋臺灣論述和傳統中華思維較為封閉且自給自足的大陸想像分道揚鑣，轉向強化臺灣的跨文化流動性格。[48]後殖民理論對於自身位置的反省以及海洋臺灣論述隱含的跨文化流動姿態，正好和黃錦樹小說所呈現的價值觀不謀而合，展現臺灣和馬華意欲反省以大中華為中心的思維模式，積極向外取資，尋找不同的跨文化交流可能。[49]無論是臺灣或者馬華，恥辱都扮演重要角色，也是兩地相互參照的跨國情感節點，華語語系恥辱提供的動能即是走出封閉的中國人認同，朝向未知而充滿無限可能性的航道出發。

綜合以上討論，我認為臺灣與馬華兩地文學生產的最大連結基礎在於：一、均呈現自我反思與自我認同轉化的特質；二、均強調多元文化、文化混雜以及跨國流動的重要性。臺灣與馬華都跳脫中華民族主義，產生認識論上的轉變。臺灣與馬華之間的跨國華語語系連結勾勒出一種「弱勢跨國主義」（minor transnationalism）。弱勢跨國主義將重心放在不同邊緣地區之間的連結，跳脫以往跨國主義預設的中心與邊緣的對立關係。[50]弱勢跨國主義的概念有助於定義臺灣與馬華之間的連結關係，也幫助我們重新思考「華語語系」一詞所隱含的理論前瞻性。目前討論華語語系這個概念時，往往強調華語語系邁向在地化途中，對中國抱有抵殖民的反抗心態，強調從邊緣位置的「華語語系發聲」（Sinophone articulation）。[51]把「articulation」翻譯成「發聲」，固然有其基進性，但是華人在地化實踐並不單純只是原鄉中國vs.華人新居地的二元對立模式，不只是邊緣發聲與後殖民抵抗。霍爾（Stuart Hall）提醒我們，「articulation」一詞除了具有「發聲」的意義外，它也是「連結」的意思，可以用來指涉兩種不同的元素如何在特定情況下產生連結。這種連結並非穩定、永恆、絕對的接

48 廖中山，《海洋臺灣 VS 大陸中國》（基隆：海洋臺灣，1995），頁 21；戴寶村，《臺灣的海洋歷史文化》（臺北：玉山社，2011），頁 21；Kuei-fen Chiu, “The Production of Indigeneity: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Cross-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200 (Dec. 2009), pp. 1076-1078.

49 黃錦樹在〈反思「南洋論述」：華馬文學、複系統與人類學視域〉一文，即提到 1990 年代後殖民理論在臺灣風行時，大馬留臺生與後殖民理論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樣不可忽略。儘管後殖民的理論方法學不能完全回應大馬華人所面對的問題，但後殖民理論對於知識生產、權力結構、論述者位置的反省，仍提供馬華論述建構的方法論基礎。見黃錦樹，〈反思「南洋論述」：華馬文學、複系統與人類學視域〉，《中外文學》29 卷 4 期（2000 年 9 月），頁 37-38。

50 Françoise Lionnet and Shu-mei Shih, *Minor Transnation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

51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p.30.

合，而是一種策略性的政治性同盟。[52]將「articulation」翻譯為「連結」，可以開展不同論述空間。不同地區華人在地化經驗的交流、切磋、相互借鑑，可作為各自反思中華文化的參照範本，展現出以華語語系為連結的弱勢跨國主義。從黃錦樹小說的案例，我們可以發現臺灣與馬華文學共同面臨在地化與重新思考華人認同的課題，兩地也發展出重視多元文化、文化混雜以及跨國流動的新思維，兩地的緊密關係恰恰好展現出以華語語系為連結的弱勢跨國主義。

必須小心的是，儘管臺灣與馬華都呈現反思華人認同的類似情感結構，但兩者仍具備不同的內涵。首先，相較於臺灣在1990年代明確喊出「告別中國」的呼聲，馬華則不排斥向中國文學與文化取資，馬華看待中華性的態度顯然較為和緩。[53]之所以如此，和馬華文壇發展的物質條件有關。馬華文學社群小，屬於依賴文學，無論是自身文學傳統或出版流通皆需要借貸其他地區文學資本，方能進一步發展，中國白話文學與文化即是重要參照。[54]因此，「反思中華文化」不必然導向「去中國化」，因為一昧抗拒中國文學與文化，不一定利於馬華文學的發展。其次，當臺灣揚棄中華認同，轉而積極打造臺灣在地想像，馬華卻面臨在地化的難題。馬來西亞的種族關係與資源分配問題，讓馬華往往對土地議題與在地化有更為複雜的反省。〈舊家的火〉處理已在臺灣定居的大馬華人返回馬來西亞的故事，這類返鄉故事一向是臺灣本土論述鍾愛的題材，不過，黃錦樹小說裡的返鄉人物之所以返鄉，目的是為了離鄉。誠如小說裡搬離膠林、遠離家園的敘事者所言，離家終究是不得不然的選擇：

> 確實，父親沒有其他的技能。一輩子在樹林裡，只懂得一些基本的種植技術。不識字。一張政府的公文就會讓他驚慌失措。和大多數人一樣，生平瑣屑，乏善可陳。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包括那些年的排華風潮，於封閉園林裡的他，如一陣騷風，最多不過是略略撩動衣角。沒有野心，也不曾冒險。這是他唯一的舞臺，有著清楚的界域，明確的物質表徵。而他終於也必須是去他的舞臺。沒有子女敢於繼承他的事業。這樣的事業原是自然的一部份。我們也必將失去我們之最初的舞臺。兩代的緘言：找土討吃，莫要找人討吃。

52 Lawrence Grossberg ed.,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Crt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141-145.

53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頁 149。

54 張錦忠，《南洋論述》，頁 129-131。

樹的時代已經結束，而今是鳥的時代。（138-139）

〈舊家的火〉以父子兩代對土地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傳達大馬華人與土地之間非常複雜的糾葛。父輩終其一生在封閉園林裡打拼奮鬥，與土地相依為命；但對於子輩來說，整個馬來西亞結構性的政治困境（排華，被視為外來者）已讓生存益發艱難，唯有展翅高飛，如鳥般，向他處的土地另覓資源，「鳥仔大隻了，每隻都要離巢，不然哪有蟲吃？」（133）。〈舊家的火〉的土地想像顯然和臺灣本土論述強調土地之愛、地方之情的書寫模式有所出入。雖然這篇小說充滿高度自傳且抒情色彩，但小說裡的抒情況味明顯遭到現實考量所截斷。土地不再單純與情感、記憶等形而上的概念連結，小說轉而探問土地的所有權、居住權、公民權等等較為現實的資源分配議題，開展出土地論述的新意。這種土地論述顯然和馬來西亞不同種族之間的摩擦息息相關。誰擁有土地？誰可以獲得較多資源？馬華如何在（馬來西亞）國家文化的論述裡成為真正的在地人？總而言之，馬華與臺灣文學雖然都共享反思中華文化的情感結構，但兩地由於先天環境上的差異，致使兩地無論是在面對中華文化的態度，或者是打造在地主體的過程裡，均開展出截然不同的格局與應對方式。這是探討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時，所不能忽視的細微處。

五、異質性的跨國接受

以上的討論嘗試分析黃錦樹的小說如何呈現出反思中華性的實踐，在此過程中，晚近臺灣文學的本土轉向提供參照座標，相互呼應，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隱然浮現。「中華民族主義主導的跨國連結」與「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大不相同：前者以同質性為基礎，強調共同的族裔、血緣、語言或認同；後者則是異質性的連結，著重在華語語系地區各自的在地化、文化混雜與認同轉化。然而，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若以弱勢跨國主義看待，歌之頌之，將簡化此跨國連結背後的權力關係。我們恐怕不能過度樂觀看待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而忽略了華語語系跨國連結背後隱含的問題。當黃錦樹自馬來西亞定居臺灣，其文學作品就必須放在跨國文化生產的脈絡下加以細膩檢視，這當中涉及文化異質性在臺灣如何被接受？在什麼樣的脈絡下受到重視？接下來，本文將把論述重點轉移到文化異質在跨國連結與傳播的過程裡如何被解讀、論述，進一步思考華語語系跨國連結可能帶來的挑戰。

我想藉由〈刻背〉這篇小說展開這個面向的討論。〈刻背〉是《刻背》一書壓卷之作，也是這本小說集的同名篇章，象徵意義可見非凡。〈刻背〉描寫小說主角鬻先生——馬來西亞當地大學教授——意外發現馬來西亞某些華人苦

力背上遭人刺字，遂與他的研究團隊著手調查，意外發現刺字出自一位英國來的現代主義小說家福先生之手。在這篇看似討論現代主義美學與形式的小說裡，黃錦樹實際上是藉「刻背」隱喻，討論馬來西亞的中華性如何被捲入整個殖民知識生產系統。馬來西亞曾是英國殖民地，英國人在華人身上刻字自然與殖民歷史互有指涉。小說特別強調，英國作家福先生將華人苦力的背視為「載體」，刻字於背，暗示這些華人苦力為英國人所有。更重要的是，銘刻中文，暗示殖民主義將華人與中華性緊緊綑綁在一起。馬來半島是多種族地區，英殖民政府採取殖民分類系統，建構馬、華、印等不同種族的種族特性與政治處境，方便種族區分與統治，大英帝國殖民者將華人定位成離散他鄉、心繫祖國的苦力移工。[55]這一套殖民敘事後來亦由馬來人主導的政府繼承，[56]持續強化華人與中華屬性之間緊密不可分割的關係。中華屬性一再鞏固華人的外來特質，不夠本土、不夠忠誠、寄生於馬來西亞的刻板印象，成了華人擺脫不掉如「芒刺在背」的痕跡。[57]從這個角度來看，「刻背」迂迴地對應大馬華人在英國與馬來人種族知識建構下的政治位置，將華人與黃錦樹所謂的「殘缺崩潰、（被污名化）的中華性」[58]綑綁在一起。

〈刻背〉這篇小說以英國人在馬華苦力背上刻字為喻，指出大馬華人在馬來西亞國家文化下如何遭到賤斥、污名化的處境，然而，〈刻背〉的企圖心不只於此，在小說裡，臺灣同樣介入了生產馬華論述的迴路。〈刻背〉最耐人尋味之處，在於小說家採用第一人稱敘述觀點，並將小說敘述者設定成一名臺灣學者。小說耐人尋味的敘述觀點闢拓了一個檢視臺灣如何觀看文化異質的空間。《刻背》一書內不少篇章都採用第一人稱敘述觀點。有趣的是，第一人稱敘述觀點在黃錦樹小說內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用法。第一種是以大馬華人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例如〈阿拉的旨意〉、〈舊家的火〉等篇，這些作品透過第一人稱敘述手法，帶有大馬華人自我敘述、自我書寫的企圖。而另一類型的小說例如〈猴屁股，火，及危險事物〉、〈補遺〉、〈刻背〉等，雖然同樣採用第一人稱敘述觀點，但敘述者卻不是當地人，而是他國華人因緣際會來到陌生的

55 Daniel P.S. Goh, “The Ideological Fantasy of British Malaya: A Postcolonial Reading of Swettenham, Clifford and Burgess,” in David C.L. Lim, ed., *Overcoming Passion for Race in Malaysia Cultural Studies* (Leiden: Brill, 2008), p. 120.

56 Amri Baharuddin Shamsul, “A History of an Identity, an Identity of a History: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Malayness’ in Malaysia Reconsidered,” in Timothy P. Barnard, ed., *Contesting Malayness: Malay Identity across Boundarie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8.

57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國家）民族主義〉，頁 185。

58 同前註，頁 187。

南方。這種第一人稱形式別具意義。不同於「當地人」現身說法的寫作手法，「非當地人」的敘述觀點帶領讀者思考另一層次的課題，亦即是作為第一人稱的「我（們）」如何認識異質東南亞華人（他者）文化？

〈刻背〉即屬於第二種，幫助我們檢視臺灣（第一人稱敘述者）如何認識文化異質的課題。小說裡大馬華人代表——苦力——非但是文盲（失去書寫能力），在小說通篇不發一語，連當地大學歷史學教授鬻先生在小說中後半部也因車禍重傷，陷入昏迷，失卻言說能力。在大馬華人紛紛失去語言能力的狀況下，小說敘述者設定為臺灣人，由臺灣學者再現整個故事。很顯然，這是一篇經由臺灣之眼凝視、敘述、再現馬華的故事。從小說的敘述觀點重新理解這一篇小說，我們可以發現，馬來西亞華人自我再現的過程裡，臺灣學術界顯然掌握了發言權，大馬華人成為被凝視的學術客體。透過實地踏查、訪談攝影、標本採集、知識生產等文化調查工作，大馬華人的日常生活與生命故事成了一個又一個學術研究計畫，如「十九世紀海峽殖民地華人苦力的生命史：疾病、醫療及休閒」、「十九—二十世紀海峽殖民地新客日常生活史」。小說的設定有其現實照應。以臺灣人作為小說敘述者的形式設計，反映臺灣在1990年代南向政策主導下，極欲看向東南亞、敘述東南亞的慾望。臺灣與東南亞之間經貿與文化向來密切，從荷治、日治時期以降，東南亞一直是臺灣海洋貿易的重要南方腹地。[59]1994年，在李登輝總統的主導下，臺灣政府提出以經貿外交為取向的南向政策。在南向政策的推動與經費挹注下，臺灣學術界出現不少東南亞相關的大型研究計畫，許多研究機構進行東南亞研究，臺灣的大學——例如暨南國際大學、淡江大學——也開始增設東南亞研究相關系所。[60]南向政策成了臺灣1990年代大規模介入、生產、重新建構東南亞論述的起點。

南向政策主導下，東南亞研究成為臺灣學術界備受關注的新興領域。〈刻背〉這篇小說顯然回應南向政策的歷史脈絡。在小說裡，南向政策促使臺灣研究團隊南下，在龐大學術資源挹注與支援下，讓苦力背後受到壓抑的歷史得以重見天日。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小說裡的臺灣研究團隊看見什麼樣的東南亞？又是如何論述東南亞？小說提到：

> 臺灣的南向政策一時之間讓東南亞研究成為島上新興的學術行業，

59 李文志，〈臺灣「南向」世界觀的建構：亞太海、陸爭霸的觀點〉，蕭新煌編，《臺灣與東南亞：南向政策與越南新娘》（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3），頁 15。

60 蕭新煌，〈重新認識東南亞的幾個課題：臺灣觀點〉，《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3 期（1997 年 12 月），頁 6。

> 鬻先生因為他在相關領域的學術地位而被某學術機構邀為顧問，主持規劃一些研究計畫。我們才有機會參與這**不可思議**的搜尋。（330）

根據小說描述，東南亞對臺灣研究團隊而言是陌生、遙遠、不可思議。這種將東南亞等同於「異質」的論述在另一篇小說〈補遺〉中，亦可窺見。「異質」無疑是臺灣研究團隊定義東南亞的重要內涵。異質性是跨文化接觸難以避免的課題。胡臺麗1990年代初期以達悟族為拍攝對象的知名紀錄片《蘭嶼觀點》，即紀錄了原漢之間的跨文化接觸，深刻觸及原漢權力關係以及原住民的異質性如何被漢人再現的議題。[61]不過，東南亞想像雖然也與異質性結合，卻必須放在截然不同的脈絡分析。馬華「文化異質」論述的生成有其歷史因緣。東南亞華人早年在臺灣被放在「華僑」的論述架構下，強調文化同質性，藉由華僑論述召喚東南亞華人心向祖國、回歸祖國。但是，隨著臺灣本土意識崛起，文化同質論述遭到廢棄，一種新的馬華論述亟待開闢。換句話說，1990年代南向政策主導所強調以南島語系、原住民、熱帶風情為連結基點的異質性，即回應了建構新的馬華論述的需求，以期擺脫大中華民族主義為框架的華僑論述。[62]東南亞華人在臺灣所代表的意義，歷經論述典範的轉移。從這個角度來說，當小說敘述者提到此番前往馬來西亞進行「**不可思議的搜索**」，這不只顯露臺灣學術團隊異地獵奇的心態，同時也透露了臺灣在南向政策的驅動下重新論述馬華的實踐，將論述取徑從中華民族主義強調的同質性，轉化為華語語系想像所側重的異質性。馬華的異質色彩標示出馬來西亞華人已經脫離「文化回歸」、「華人同質性」等論述框架，轉而勾勒不同華語語系地區大相逕庭的異質在地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當臺灣學界急於強調東南亞的文化異質色彩，〈刻背〉以雙線交錯迂迴地帶出此文化異質論述背後的隱憂。這群隨南向政策至馬來西亞進行「**不可思議的搜索**」的學者，一方面展開異地獵奇，另一方面擔憂臺灣家園的政治獨立運動。小說在此帶入臺灣本土論述的身影：

> 此時臺海局勢突然變得很緊張。陰雲密佈。年輕的總統突然被不明原因的疾病侵襲，先是聲音沙啞，隨即臥病在床，很快的陷於嚴重的意識不清。一個月後，因「無法順利執行總統職務」而被迫由副手暫代，那個因「嘿嘿嘿」而聲名大噪的女鐘樓怪人——誠如所有人預料的——馬上哈哈哈的宣布獨立。臺灣民主國二度降生。（336）

61 可參考胡臺麗，《文化展演與臺灣原住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特別是《蘭嶼觀點》的座談會會議記錄，頗值得參考，見該書收錄的〈《蘭嶼觀點》的多面觀點：試映會後座談〉一文。

62 蕭新煌，〈重新認識東南亞的幾個課題〉，頁3-4。

小說在此以臺灣民主國影射臺灣獨立運動。從小說一開始，女鐘樓怪人宣布獨立，到小說後半部分，女鐘樓怪人在馬來西亞酒店向群眾演講，高喊「臺灣人民、站起來」（358），女鐘樓怪人在小說裡反覆出現，如小說潛文本，對應南向學術田野之旅。小說在此提醒我們，這群前往馬來西亞蒐集田野資料的學者如何幽微地與臺灣民族主義互有對話、指涉。誠如學者指出，臺灣在本土化趨勢下提出的南向政策，正是透過凝視、敘述、研究、再現東南亞等種種舉措來鞏固臺灣自身的主體性。[63]

顯然，強調馬華異質性的策略雖然可凸顯馬華與臺灣文化的不同，挑戰以往臺灣僑務文化政策背後的大中華意識型態，但文化異質的論述策略卻隱含危機。我們要問，誰在強化異質性？在什麼樣的脈絡下強化異質性？為了達到什麼樣的目的？以異質性為基礎的馬華想像必須被放在臺灣南向政策的脈絡下加以解讀。無論是李登輝或陳水扁時期，南向政策目的可能不是基於對東南亞的興趣，更大的目的是為了緩和臺灣資本西進中國的熱潮，降低臺灣對中國依賴，「南向」成為「西進」的替代方案。[64]兩次南向政策背後鑲嵌了一個共享論述邏輯，亦即是透過「臺灣與東南亞的連結」來牽制「中國勢力滲透」。蔣淑貞的說法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馬華符號在臺灣的曖昧位置：馬華之所以備受矚目，一方面是因為馬華跟臺灣一樣，從中華文化大傘下分房成功，獨立於外；另一方面，馬華的異質色彩卻也被臺灣文化場域策略性挪用，將中國賤斥其外，進而打造一個多元跨國的臺灣主體想像，讓臺灣向國際化邁進。[65]從這個角度來談，我們才能理解從1960年代以來，馬華文學在臺灣便陸陸續續有不少傑出的作品產出，但何以較具系統性與學術規模的在臺馬華文學論述卻遲至1990年代才正式登場。如此遲，有其環境條件與歷史時空的限制，和臺灣的中華意識與臺灣意識的消長有關，也和臺灣極力擺脫依賴中國，建立臺灣自身國際連結的企圖心有關。1990年代打造的馬華想像雖然以「文化異質」論述挑戰以往的「文化同質」論述，跳脫大中華民族主義，但此文化異質論述背後可能與臺灣民族主義匯流。臺灣與馬華之間跨國連結背後潛藏的隱憂，恐怕得小心處理。

從更大視野來看，臺灣與馬華跨國連結的問題反映出華語語系連結可能潛藏的挑戰。《刻背》收錄在王德威在麥田出版社規劃的「當代小說家」書系，

63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臺北：行人出版社，2007），頁 41-76。

64 李文志，〈臺灣「南向」世界觀的建構〉，頁 6；陳佩修，〈南向政策的重新評估：兩岸關係停滯下臺灣的對外新策略〉，《全球政治評論》2 期（2003 年 4 月），頁 67。

65 蔣淑貞，〈從「海內存知己」到「海外存異己」：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建制化〉，論文發表於 2005 年文化研究年會，新竹交通大學，2005 年 1 月 8-9 日。

這一個系列收錄臺灣、中國、香港、馬華等地小說創作，企圖勾勒出當代華文文學創作的活力與多元並陳的異質色彩。[66]換言之，《刻背》與華語語系文學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是此書一大可觀之處。黃錦樹在寫作《刻背》時，非常有自覺地試圖回應馬華文學在整個華文文學生產的處境。黃錦樹在一場與駱以軍的訪談裡，曾談到《刻背》的寫作動機：

> 當初王德威先生向我邀稿，我其實非常心虛，自覺寫得太少又不夠好。[...]後來我大致理解我佔的大概是地域保障名額[...]我原本爭取做二十號（叢書的最後一本），但主編不肯。這是美中不足之處。**末位是馬華文學的真正位子。也因為這是中文小說界的大型選集，我想也該藉這個機會回應一下整個當代中文小說。**（黃錦樹2005: 313，粗體為我所強調）

在華文文學版圖想像的脈絡裡，黃錦樹將自己與馬華文學的位置定位在「末位」——雖然存在，但總是遭到遺忘的位置——這樣的說法顯然挑戰了王德威原先規劃叢書計畫的企圖。兩人雖然同樣企圖要呈現異質的華文文學想像，但兩人對於異質的定義與評價不大相同。如果王德威意欲呈現異質華文文學的多元繽紛、眾聲喧嘩，那麼黃錦樹則偏偏要指出華文文學想像背後隱含位階高下之別、優劣之分。華語語系地區在文化養成、文學市場、政治經濟等大小規模的區別下，讓一部分華語語系地區的文學生產備受關受，而另一部份地區雖在華語語系版圖佔有（形式上）一席之地，但實際上卻乏人問津，只能以文化異質的姿態登場，增添華語語系想像的豐富多樣性。

異質性是《刻背》一大特色，同時也是這本書對華語語系文學圈提出的最大挑戰。[67]根據黃錦樹說法，他原先的寫作計畫是打算以一本「偽馬華文學史」的方式登場，整本書從封面、目錄、內頁編排均是刻意為之，在〈大河的水聲〉可以明顯看到小說家的寫作嘗試。文學集、文學大系或文學史在跨文化交流扮演重要角色，是不同地區認識異地文學生產最便捷的入門管道。然而，黃錦樹以後設方式呈現的文學史，卻暴露出跨文化交流的難題。這本書從封面的馬來文書名，一直到《刻背》裡頭刻意安排的馬華現實指涉，把異質性推到極致，但又真假難辨、影影綽綽。熟悉馬華情境者，一看皆知，但對於不熟悉者，在《刻背》缺乏大規模附錄、索引、註釋相互參照的前提下，這本小說集無疑是一本密碼書。以後設方式呈現的「偽馬華文學史」帶出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亦即是文學生產如何在跨國華文閱讀市場下被接受、閱讀、詮釋？帶來什麼樣的

66 王德威，〈編輯前言〉，收錄於黃錦樹著，《刻背》，頁 3。

67 高嘉謙，〈歷史與敘事〉，頁 152。

挑戰？換言之，異質性雖然是華語語系文學版圖的重要內涵，但不同華語語系地區如何在異質性的前提下，進一步深入理解其他地區的文學生產，可能是亟待思考的課題。華文圈是否具備理解馬華在地課題的知識？華語語系內部的對話如何可能？衍生出什麼樣新的倫理課題？《刻背》所提出的這些尖銳問題，標示出異質性在華語語系跨國連結所暗藏的諸多問題。

六、結論

這篇文章透過黃錦樹《刻背》個案，勾勒臺灣與馬華文學的跨國華語語系連結。華語語系相關研究主張，晚近華人逐漸建構各自的在地認同，不再自視為中國人，本文在華語語系的前提下，進一步主張不同華人地區在地化經驗的交流、互通，替我們勾勒了一種有別於以往文化回歸模式的華人連結模式。藉由黃錦樹的《刻背》，我們可以看到大馬華人如何經歷自我認同的移轉，衍生出重新反思馬來西亞華人認同的具體實踐，同時我們也看到臺灣本土論述風起雲湧的脈動，如何成為在臺馬華小說家建構其馬華論述的參考座標。黃錦樹小說以開闊的視野讓一條從馬華到臺灣，再返回馬華的華語語系跨國連結路徑浮現。

然而，本文也試圖強調，這一條跨國連結之所以浮現，並非偶然。從1990年代以來，馬華文學與相關論述在臺灣場域備受矚目，異質馬華彷彿成為臺灣渴望瞭解的對象，但這種慾望的本質究竟為何？「異質馬華」的論述取徑之所以能在臺灣學術界取得一席之地，一方面仰賴在臺馬華學者與作家的打拼，另一方面也和臺灣本土論述發展過程裡，積極強調多元、混雜、異質、建立臺灣主體性等文化想像息息相關。這樣的思考邏輯提醒我們，需進一步反省臺灣與馬華連結背後可能產生的問題。臺灣為什麼看見馬華？臺灣看見什麼樣的馬華？臺灣是否看見馬華？以此為起點，我們可以發現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充滿挑戰。談論華語語系世界的文化異質時，不可用多元文化差異輕輕帶過，而需帶入新的思維，思考華語語系內部不同的社群該如何彼此認識、對話、乃至於協商。華語語系作為方法，所面臨最大的挑戰，恐怕不只是如何對抗中國文化霸權，而是如何回應不同華語語系地區之間的結盟關係與權力流動。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一）專書／專書論文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

王德威，〈編輯前言〉，收錄於黃錦樹著，《刻背》，臺北：麥田出版，2001。

———，〈壞孩子黃錦樹：黃錦樹的馬華論述與敘述〉，收錄於黃錦樹著，《刻背》，臺北：麥田出版，2001。

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何啟良，《文化馬華：繼承與批判》，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9。

李文志，〈臺灣「南向」世界觀的建構：亞太海、陸爭霸的觀點〉，收錄於蕭新煌編，《臺灣與東南亞：南向政策與越南新娘》，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3。

林建國，〈反居所浪遊：讀黃錦樹的《夢與豬與黎明》〉，收錄於黃錦樹著，《刻背》，臺北：麥田出版，2001。

———，〈為什麼馬華文學〉，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主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II》，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

邱貴芬，〈翻譯驅動力下的臺灣文學生產〉，收錄於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張誦聖、劉亮雅合著，《臺灣小說史論》，臺北：麥田出版，2007。

胡臺麗，《文化展演與臺灣原住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范雅梅，《論 1949 年以後國民黨政權的僑務政策：從流亡政權、在地知識與國際脈絡談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2005。

張小虹，〈現代性的小腳：文化易界與日常生活踐履〉，收錄於馮品佳編，《通識人文十一講》，臺北：麥田出版，2004。

張錦忠，〈謔近於虐《刻背》〉，《聯合報》第 30 版（聯合副刊），2001 年 12 月 10 日。

———，〈中國影響論與馬華文學〉，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編，《馬華文學讀本Ⅱ：赤道回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

———，〈文化回歸、離散臺灣與跨國旅行性：「在臺馬華文學」的案例〉，

李有成、張錦忠主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臺北：允晨文化，2010。

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臺北：麥田出版，2003。

莊華興，〈離散華文作家的書寫困境：以黃錦樹為例〉，陳建忠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11。

陳大為，〈「馬華文學視角」VS「臺灣口味」〉，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辣味馬華文學：90 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2002。

———，〈鼎立的態勢：當代馬華文學的三大板塊〉，《風格的煉成：亞洲華文文學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9。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臺北：行人出版社，2007。

陳光興編，《批判連帶──2005 亞洲華人文化論壇》，臺北：唐山出版社，2005。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陳慧嬌，《偶然生為僑生：戰後不同世代華裔馬來西亞人來臺求學的身份認同》，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06。

黃錦樹，《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吉隆坡：華社，1996。

———，《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元尊文化，1998。

———，《刻背》，臺北：麥田出版，2001。

———，〈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畫？〉，《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臺北：麥田出版，2003。

———，《土與火》，臺北：麥田出版，2005。

———，〈無國籍華文文學：在臺馬華文學的史前史，或臺灣文學史上的非臺灣文學：一個文學史的比較綱領〉，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臺灣文學史》，臺北：麥田出版，2007。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

端木虹，〈經典缺席？〉，收錄於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辣味馬華文學：90 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2002。

廖中山，《海洋臺灣 VS 大陸中國》，基隆：海洋臺灣，1995。

戴寶村，《臺灣的海洋歷史文化》，臺北：玉山社，2011。

（二）期刊論文

安煥然，〈內在中國與鄉土情懷的交雜：試論大馬旅臺知識群的鄉土認同意識〉，《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1 期（2003 年 8 月），頁 239-301。

高嘉謙，〈歷史與敘事：論黃錦樹的寓言書寫〉，《中國現代文學》9 期（2006 年 6 月），頁 143-164。

———，〈骸骨與銘刻：論黃錦樹、郁達夫與流亡詩學〉，《臺大文史哲學報》74 期（2011 年 5 月），頁 103-125。

陳大為，〈大馬旅臺文學一九九 O〉，《臺灣文學館通訊》33 期（2011 年 12 月），頁 40-43。

陳志明，〈華人與東南亞民族的形成〉，《亞洲文化》9 期（1987 年 4 月），頁 54-68。

陳佩修，〈南向政策的重新評估：兩岸關係停滯下臺灣的對外新策略〉，《全球政治評論》2 期（2003 年 4 月），頁 67-82。

黃錦樹，〈反思「南洋論述」：華馬文學、複系統與人類學視域〉，《中外文學》29 卷 4 期（2000 年 9 月），頁 36-57。

———，〈馬華文學與（國家）民族主義：論馬華文學的創傷現代性〉，《中外文學》34 卷 8 期（2006 年 1 月），頁 175-192。

———，〈旅臺、馬共與盆栽境遇〉，《文化研究》第 7 期（2008 年秋），頁 75-104。

詹閔旭，〈恥辱與華語語系主體：施叔青《行過洛津》的地方想像與實踐〉，《中外文學》41 卷 2 期（2012 年 6 月），頁 55-84。

劉建基，〈從全球倫理論異域文化的邊緣議題：以黃錦樹《由島至島——刻背》為例〉，《中外文學》35 卷 4 期（2006 年 9 月），頁 37-55。

蔣淑貞，〈從「海內存知己」到「海外存異己」：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建制化〉，論文發表於 2005 年文化研究年會，新竹交通大學，2005 年 1 月 8-9 日。

蕭新煌，〈重新認識東南亞的幾個課題：臺灣觀點〉，《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3 期（1997 年 12 月），頁 3-10。

二、翻譯及外文著作

Chiu, Kuei-fen. “Empire of the Chinese Sign: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Diasporic

Imagination in Transnational Literary P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7.2 (May 2008), pp. 593-620.

————————. "The Production of Indigeneity: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Cross-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200 (Dec. 2009), pp. 1071-1087.

Goh, Daniel P.S. "The Ideological Fantasy of British Malaya: A Postcolonial Reading of Swettenham, Clifford and Burgess." in David C.L. Lim (ed.). *Overcoming Passion for Race in Malaysia Cultural Studies*. Leiden: Brill, 2008.

Grossberg, Lawrence (ed.).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Crt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Hsiao, Hsin-Huang Michael. "Emerging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Rise of a Demanding Civil Society in Taiwa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 (Jun. 1990), pp. 163-180.

Hutchison, Emma and Roland Bleiker. "Emotional Reconciliation: Reconstituting Identity and Community after Trauma."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1.3(Aug. 2008), pp. 385-403.

Lionnet, Françoise and Shu-mei Shih. *Minor Transnation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Munt, Sally R.. *Queer Attachment: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hame*. Hampshire and Burlington: Ashgate, 2007.

Shamsul, Amri Baharuddin. "A History of an Identity, an Identity of a History: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Malayness' in Malaysia Reconsidered." in Timothy P. Barnard (ed.). *Contesting Malayness: Malay Identity across Boundarie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4.

Shih, Shu-mei, Chien-hsin Tsai, & Brian Bernards (ed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Shih, Shu-mei.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Tomkins, Silvan. *Affect, Imagery, Consciousness: The Complete Edition*.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Tsu, Jing & David Der-wei Wang (eds.).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Boston: Brill, 2010.

Transnational Sinophone Articulation: Taiwan-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Zhan, Min-xu*

Abstract

Current Chinese studies tend to conceptualize the idea of global Chinese imagination in terms of cultural nostalgia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inherent the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with the rise of lo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Sinophone world, we are increasingly called upon to pay attention to a new type of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 namely, the transnational Sinophone articulation. This new type of minor transnationalism concerns how the Sinophone world is articulated by the shared structures of the feeling of being ashamed of one's Chinese heritages and identity. This paper argues, via the case study of Ng Kim Chew's novel, how this new type of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otion of "Sinophone." Ng Kim Chew's works were first published in Taiwan and have been entangl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vist movement in Taiwan since the 1980s. His transnational literary production helps shed light on the intriguing connection, interplay, and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Taiwanese identity and the Sinophone Malaysian identity. Insofar as heterogeneity is celebrated in Sinophone studies, this paper also seeks to critically examine the dark side of such a heterogeneous Sinophone imagination.

Keywords: Sinophone literature, Taiwan-based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Ng Kim Chew, affect, shame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